

# 出版說明

「校長論壇」是2020年由中華教育文化交流基金會發起主辦，由香港中華書局與香港管理學院、集古齋承辦，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香港文聯）、香港美協等機構協辦的文化活動品牌。其目的是面向香港的教育實踐與發展研究，以香港中小學為切入點，通過一系列論壇、講座等文化活動來弘揚中華文化，構建一個促進香港教育發展的開放性文化教育交流平台。

「校長論壇」主要活動形式是每月一次的主題討論，由主辦方和校方合作推出論壇主題，然後邀請相關著名專家學者與校長們和老師們一起通過線上線下分享新的教育研究學術成果、學校教育管理新觀念、新方法，特別是中國文化教育的經驗，促進學術、出版與學校之間的溝通交流，冀全面提升學校管理水準，促進香港社會的文化建設。

本書收錄了校長論壇2020至2021年度共十一場活動的精彩內容，包括金耀基、陳萬雄、林天行、李子建、丁新豹、林超英、梁貫成、蘇詠梅等學者與十多位校長的對談。十一場論壇主題多元，涵蓋教育理念、領導風格與學校管理、藝術教育、生命教育、家庭教育、STEM教育、理財教育等多個範疇，回應了當今香港教育的需求，也集中反映了文化教育學術研究的新動態和新成果。

本書以文字的方式記錄了十一場論壇全貌。這些文字充分體現了香港當代教育者的實踐活動，凝聚了香港教育界和海內外學術界、文化界的教育研究成果，這是校長論壇選萃出版的第一輯，是校長論壇趨向成熟的一個里程碑。隨着「校長論壇」主題和活動越益廣泛和深入，相關出版物也會陸續問世，希望它可以帶給香港教育工作者一點啟發，推動本地教育進步。

# 目錄

	出版說明	i		
	大學教育的人文價值 金耀基教授	2		
	領導風格與管理成效 謝振強總幹事 張勇邦校長	11		
	閱讀的魅力 陳萬雄博士	19		
	從閱讀中學習的演變：過去、現在及未來 葉淑婷校長 方子衡校長 陳敏儀女士	27		
	藝術與成長 林天行先生	39		
	藝術在校園 楊楚傑校長 葉淑婷校長	48		
	生命及價值觀教育在香港：回顧與前瞻 李子建教授			61
	21 世紀的香港德育 梁超然校長 葉偉儀校長			79
	人傑地靈： 從香山之行窺探歷史文化的全方位學習 丁新豹博士 梁操雅博士 葉深銘博士			90
	「環保」？還是「保環」？ 林超英先生			107
	校園環保的可持續發展 張昌明校長 朱國強校長			119
	為甚麼要學數學 —— 每一個人都要學「加減乘除」以外的數學嗎？ 梁貫成教授 BBS			128
	活的數學 —— 數學不只是計算 鄧志鵬校長 周瑞忠校長			139



8 有教無「累」？有教無「慮」！  
——後千禧年代教育的挑戰  
曾詠恆醫生 150

「繁」與「煩」  
——校長、醫生如何平衡工作與親子教育  
陳小燕校長 王欣浩醫生 157

9 STEM 與 STEM 教育  
蘇詠梅教授 168

從 STEM 中尋找樂趣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徐劍校長 179

從 STEM 中尋找樂趣  
——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林嘉康校長 186

10 理財？還是理才？  
——理財教育 Part 1  
謝汝康先生 陳淑儀校長 191

理財？還是理才？  
——理財教育 Part 2  
陳淑儀校長 206

11 道德與文化智能  
陳家偉校長 214

生命教育 Magic Talk  
莫培超校長 田少斌校長 220

## 大學教育的人文價值

### 金耀基教授

著名社會學家、教育家。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西泠印社社員，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 中國人文精神與價值之特性與形態

我們今天對「人文」二字都有一種理解，似乎是不辯自明的，但事實上是不是這樣的簡單自明呢？

我們今天講解「人文」二字幾乎都會從《易經》中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句話來入手。誠然，這是對中國的人文精神與價值之理解的一個切入點。《辭海》引疏之解釋：「言聖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毋庸諱言，這一個對人文之釋義是中國思想之主流的儒家式的詮釋。大家知道儒家的經典是《詩》、《書》、《禮》、《樂》、《易》、《春秋》（此為六經，因《樂》早佚，故今為五經）。孔子「述而不作」，他是對先民的知識加以整理潤飾，才使其成為儒家之經典，而孔子亦被公認為是中國人文思想的奠基人，也是儒家的開創者。孔子生於一個「禮樂崩壞」的時代，他則重建了「禮樂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在禮之外提出仁的思想。孔子心中的人文，不只是重禮樂之儀文，更在強調禮樂之核心的仁，仁是文之德，他以文德來拯救當時文弊。

孔子提出的仁，是文之德，這是界定了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所謂「仁者，人也」，孔子之重仁、重文之德，在儒家孟子手裏，更得到強化與發揮，因而論先秦儒家之思想，孔孟齊稱。到了宋之理學，則孔孟重人與重

「文之德」之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而成就了重「人極」的學問。可以說，儒家正統的人文精神與價值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自孔孟到宋儒一路發展的人文思想的特性是以道德與倫理為主心的。宋大儒朱熹審定的四書之一的《大學》一書，其開卷語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止於至善」是讀書人企求的終極願景，「至善」是人文價值的最高境界。《易經》上說的「化成天下」實是指「善」成為普遍化（天下）的道德與倫理文化。故儒家的「人文」可以說是一種求「善」的倫理文化。但中國的人文精神之表現也可以有與儒家之禮樂文化，與儒家以求善的內涵的倫理文化殊為不同的形態，這就是魏晉時代的玄學之審美文化。玄學是承接先秦莊子的思想而來。莊子之學，講到底，是貶人為、貴自然，講齊生死，一壽夭，尋求為西方存在主義所重的「真實的存在」，尋求解放，尋求自我、真我。真正做到「真人」、「神人」。李澤厚說：「莊子哲學並不以宗教經驗為依歸，而毋寧以其他審美態度為指向。就實質說，莊子哲學即美學。」<sup>1</sup>

魏晉人處於中國政治社會的衰世，對於漢魏晉間政治上的禪讓等，他們認為是一大虛偽，是假借與文飾。他們要求擺脫外在禮義之規範，有一種人之自覺意識。像莊子一樣，尋求自我的解放與自由，尋求個體的真實存在。阮籍、嵇康之非堯舜、薄湯武，以禮豈為我輩設，實是在追求自我和大解放。這種思想表現於文學、藝術上則與儒家之禮樂世界大異，是一種如唐君毅所說的「觀照、欣賞、優遊的藝術精神」，所以可看作是中國人文精神之另一種形態。<sup>2</sup> 這種形態可稱為人文的審美文化，它與儒家人文的倫理文化的形態在中國文化中是並立同存的。在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劉勰在其傳世名篇《文心雕龍》中顯示的文學之獨立性與審美價值。劉勰固然強調「文必宗經」，即以道德論文學之價值，但他實際上卻把藝術之審美觀放在宗經的道德觀之上。他對屈原的《離騷》的評價超過了《詩經》。邵耀成說：「劉勰雖

1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189。  
2 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頁31。

然打着『徵聖、宗經』的旗幟，但他的《文心雕龍》中的三個篇章《原道》、《辨騷》、《神思》，卻完全顛覆了儒家『言志、教化、諷喻』的價值觀。」<sup>3</sup>

我們可以說，劉勰的文論有力地說明了審美文化一直是中國人文精神與價值的重要組成。審美文化也即是中國經學之外的藝術文化，它包括書法、繪畫、建築、詩詞、戲曲、小說等。新文化運動中反對、批判的中心對象是儒家的經學文化（即上面所說儒家人文倫理文化），不是中國的藝術文化。

### 中國百年學術文化的變向：從經學到科學

中國百年的學術文化之變向，最簡要地說，是從經學轉到了科學。我指出這是中國現代化的主旋律之一，而承擔這個變向的最主要的基地則是高等教育機構。傳統中國有「太學」。「太學」與「大學」只有一「點」之別，但太學以經學（四書五經）為核心，大學則以科學為核心，兩者在學術文化的性質上迥然有別。

自漢至清，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不論是官學（如太學）或私學（如宋之書院），皆以四書五經為教育之核心。此與西方之中世紀大學以《聖經》為教育之核心並無二致。中國的大學是中國現代化之產物，而大學亦在中國現代化中發揮了至關緊要的功能。中國的大學（作為一種教育與學術的制度）不是經太學自上而下縱向地承接過來的，它是從西方的「現代大學」制，自西而東橫向地移植過來的。在此特應說明，中國自歐洲移植過來的大學不是西方傳統的「中世紀大學」，而是經德國大學改革後的「現代大學」。西方現代大學之所以不同於西方的中世紀大學，是因為前者以科學取代了後者八百年來以神學（《聖經》）作為教育的核心，而中國的現代大學與西方的現代大學幾乎是同步的，中國的現代大學一開始就像西方的現代大學一樣，以科學作為知識發展與教育的重心。中國之開始接受現代科學，把科學列入教育機

3 邵耀成：《文心雕龍這本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構中，是在鴉片戰爭戰敗後發起洋務自強運動始。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自強運動，重點固是開鐵礦、製槍炮這類「以夷制夷」的軍事工業化，但亦同時設置同文館，學西文，學西方的學術，如數學、物理等「西學」。維新運動後，學習西學更有擴展，1905年清廷頒詔「廢科舉、設學校」，自此讀書人以經學考試進入仕途之路已斷，經學從作為「中國人思想之君主」（馮友蘭語）的位置退位了，同時，西學（特別是科學）則進入新立的教育體制中心。1911年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教育部教育總長蔡元培頒佈了《大學令》，「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宏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廢去忠君、尊孔等封建信條。確定大學分為文、理、法、商、醫、農、工七科，以文、理二科為主，取消經學科」<sup>4</sup>，經學在《大學令》中被取消了。

不過，應該指出，經學在大學被退出的是它過去兩千年在太學中享有的聖典的地位，經學並沒有在中國現代大學中完全消失。事實上，經學部分的內容已被納入到大學中的「文科」中，如《周易》、《論語》、《孟子》納入到文科的哲學門，《詩經》納入到文科的文學門，《尚書》、《春秋》納入到文科的史學門。1912年，京師大學堂正式改名為北京大學，首任校長嚴復就將經學科併入文科。從現代大學的知識結構來看，相比於各種專業科學學院（如商、醫、傳播、教育等），科學之進入大學的意義比之經學之退出大學更為重大。中國的現代大學，以文、理二科為主，亦即科學（理科）一開始就成為大學殿堂的主角，須知在傳統中國的「太學」，科學是從不存在的。在20世紀，從世界範圍來考察，科學獲得了史無前例的發展，而大學恰恰正是科學發展的重地。中國的大學在百年中，雖歷經外禍（日本侵華）內亂（「文化大革命」），仍從無到有，從有到多，獲得長足進步與發展。大學的教育到了今日已與國際接軌，像歐美先進國家之大學一樣，科學在中國大學中亦居於顯學的地位。在大學的知識譜系中，科學的領域不斷擴大，除自然科學外，有社會科學、應用科學（如工學院），甚至有的傳統的文科學系（如語

4 梁柱：《蔡元培與北京大學》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言學、歷史學)亦從「人文學科」轉向「人文科學」或「人的科學」(Human Sciences)，大學的科學的精神氣質已滲透到大學的整個知識結構。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認為今天的大學(包括中國的)，特別是研究型大學，已成為一「認知性的知識叢」。可以說現代大學已成科學知識的創新與教育的中心。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標舉「科學」與「民主」之旗幟，百年來，德先生(民主)的命運充滿滄桑，但民主畢竟已成為中國現代政治中的一個文化理念；而賽先生(科學)的命運則好得多，科學隨現代大學之發展得到了重大的發展，並且科學作為一種文化也經大學傳播到整個社會，影響了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生活情狀，乃至人生觀和宇宙觀。誠然，「五四」前後人們講「新文化」，我認為中國如有新文化，那麼最突出的必是「科學文化」。這是傳統的中國文化中沒有的，無疑的，科學文化大大豐富擴大了中國文化的內涵。其實，中國百年來新開展的「科學文化」亦是構建中國現代文明的主要文化力量。

## 科學與人文之關係的究竟意義

探究科學與人文之關係，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語境中是不會出現的，我上面引《易經》對人文之定義，「言聖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其中根本沒有「科學」的影子。但如今科學文化已成為中國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則科學與人文之關係便自然成為一個探究的題目。長年以來，在大學的知識結構中，人文學與科學形成了兩個學術羣體，二者之間隔膜多於關心，互相低視多於互相高看。1959年，劍橋大學的斯諾爵士(C. P. Snow)發表了演講《兩種文化及科學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這場演講一石擊起千尺浪。斯諾本人是科學家，也是人文學者(小說家)，他提出劍橋的學術文化已分裂為兩個壁壘森嚴的世界，一個是人文的，一個是科學的；他對兩種學者都有批評，他批評科學家缺少人文的修養，他更批評人文學者是 natural Luddites，亦即是對科學一無所知，對機器、科技有敵意的人。可以想見，斯諾的演講激起了劍橋人文學者利維斯(F. R. Leavis)的強烈抨擊，更引發了太平洋彼岸美國學術文化界的強烈反應。事實上，斯諾發表論文的時候，科學在大學(東西方大學)的地位

已經大為上升，壓倒了人文學。更確切地說，到了20世紀下半葉，科學在大學的知識發展中已經當陽稱尊，人文學則黯然失色。更有甚者，有些人文學者已信奉科學為知識之標杆，亦即自覺或不自覺地追隨科學，以「科學方法」研究人文課題，故我在上面提到傳統的「人文學科」轉向「人文科學」。這是說在科學的精神氣質的滲透與膨脹下，人們普遍認為只有如科學的知識才是知識，否則便沒資格稱為知識。這是貝拉(Robert Bellah)等學者所批判的現代大學出現的「知識的科學範典」。誠然，在「知識的科學範典」下，科學已成為建立知識的標準與範典了。這意味着甚麼呢？簡單說，這強烈顯示科學在知識殿堂中的地位的上升，這不只是說科學不僅被承認是知識的一種(須知，在中西傳統的知識系統中，科學作為一種知識的觀點曾在長期內是不存在的)，而且把科學與知識等同起來。這種「唯科學的知識觀」可說是「科學主義」的具體表現，在中國當代知識界也不無有之。

誠然，「唯科學的知識觀」在20世紀後期也淡褪了，我們今天應有一理解，知識不是單維單元的，而是多維多元的。科學是以求「真」為目的的理論知識，它與中國傳統上以求「善」為目的的倫理知識(倫理學)，以及以求「美」為目的的審美知識(美學)，屬於不同的知識範疇(我在2009年所寫《從大學之道說中國哲學之方向》一文，對此有較詳盡的論述)。<sup>5</sup>

講到這裏，我想試對「科學」與「人文」之關係做一疏解。我之所以有意對「科學」與「人文」之關係做一疏解，是美國一位科學家赫施巴赫(Dudley Herschbach)的一段話所引起的。赫施巴赫是哈佛大學的教授，也是1986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他覺得人們對科學有極大的誤解，滿腹怨氣。他說科學家是「努力想弄懂大自然的詞彙和文法，藉此為人類謀福祉」。他認為：「科學知識是一種具有實用意義的東西，而且也是我們文化一個重要部分。」他說：

5 鄭宗義編：《中國哲學研究之新方向》，「新亞學術集刊」第20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2014。